

大學用書

中國教育思想史

郭齊家 著
崔光宙 審訂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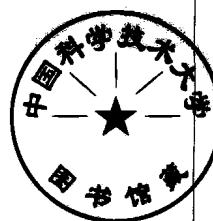
大學用書

中國教育思想史

郭齊家著

臺灣版審訂者

崔光宙



三聯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ISBN 957-11-0105-2

出 版 聲 明

本書業經作者暨原出版機構同意，授權本公司在臺合法印行。若有侵害本書權益者，本公司當依法追究之。特此聲明。

中國教育思想史

中華民國 79 年 6 月初版

著作者 郭 齊 家
審訂者 崔 光 宙
發行人 楊 榮 川
發行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
臺北市銅山街 1 號
電話：3916542
郵政劃撥：0106895-3

印刷所 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雙十路 2 段 46 巷 22 弄 11 號
電話：2513529

基本定價： 7 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ISBN 957-11-0105-2

序

每當我看到我學生的著作問世時，總是很高興的。本書的作者也是我的學生。二十多年前他還任過我的助教，跟隨我多年。那時我就覺得他是一位勤奮好學的青年，我有意培養他，給他壓任務，讓他早上講臺，果然有效果。後來他得了病，病的時間還很長，我看到他的病容，很惋惜。值得慶幸的是，他的病居然治好了，現在又活躍在教學第一線了，聽說他講課很風趣，很受學生們的歡迎。這本書可說是他多年從事教學和研究的結晶。

這本書稿放在我這裏已有兩個多月了，我年老多病，眼睛也不好，每天只能看一點，有的章節細看了，有的章節只是粗略地翻了翻。總的說，我覺得這本書寫得是好的。這本書既寫了古代教育思想，也寫了近現代的教育思想，它既是專著，亦可當教材。它既重視教育思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重視對這些教育思想史料的分析和駕馭。它既對每一個時期教育思想總的傾向和特點加以概括和說明，又抓住每一位教育思想家的個性特點有重點地論述，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無特色。它既吸取了前輩人和當代教育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自己獨特的分析和創見。書中還採用了比較法，如對孔墨、對孟荀、對儒墨道法、對程朱與陸王的教育思想有比較的分析，還有中與外比，前

與後比，這也是我多年提倡的。總之，本書對中國教育思想史進行了較深入的論述，取材較博，分析較密，提要鉤玄，得其要旨，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對「中國教育史」學科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近幾年來，教育史學界很活躍，出了不少成果，但總的說，「中國教育史」還是屬於比較年輕的學科。我們是具有數千年文明的國家，我們有豐富的教育史料。國外學者對我們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也很重視，他們注意研究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土特產」，這些「土特產」有的也具有世界意義。我們中國教育思想積蘊很深，很有特色，如果簡單地加以否定，只概括幾點消極、落後的東西，以偏概全，武斷對待，我是不贊成的。我贊成深入研究，前幾年我給研究生講課時就說過，「中國教育史」要從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多方法的研究，要開拓研究的新領域、新途徑。我們要從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斷代教育史、專題教育史、各地區教育發展史、各學派教育發展史、教材教法發展史、少數民族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等等，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地加以研究。這些工作我是難以做了，我寄希望於中青年學者，「後生可畏，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我深信年輕一代會超過我們這一代的。

我是肯定這本書的，願向讀者推薦這本書。我也希望中青年學者寫出更多、更有水準的著作來，多種多樣，各放異彩，這是我至誠的希望。

毛 禮 銳

前 言

中國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豐富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化是中華民族長期延續不斷發展的精神支柱。中國古代的教育不僅是豐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國古代文化所賴以延續和發展的基礎。因為豐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是靠古代教育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之一。由於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遠在四五千年前，就開始了有組織的教育活動。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教育家。據《尚書·舜典》載，虞時即設有學官，管理教育事務。如以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負責對人民進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種倫理道德的教育責任；由夔典樂，即負責對人民進行音樂和詩歌的教育責任。由於我們中華民族具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所以四千多年來，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不僅能一脈相承，歷久彌新，而且我國古代文化的內涵，也較世界上其它古老的民族，更加充實而光輝。在這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了無數個閃爍着智慧光芒的教育家，為傳播豐富燦爛的中國文化、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中國歷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國歷代客觀教育史實際理論上的反映。中國教育思想發展史，

記錄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歲月裏教育實踐與教育理論發生發展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國最早的思想，是載於《尚書·周書》中的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是箕子和周公的教育思想，仍夾雜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中，尚沒有系統化。真正系統化、形成獨立體系的教育思想，還是從孔子開始的。我國遠在兩千幾百年前就有了自成獨立體系的教育思想出現，這是可以引為自豪的。在我國歷史上，從孔夫子到陶行知，湧現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家與教育流派，有如繁星燦爛，他們各自體現了時代的精神面貌，代表著教育實踐與教育理論的發展演變中的各個階段。

中國教育思想，從古代到近現代，連綿數千年，除了時代的差異、歷史發展階段的差異之外，還有地域、民族的差異。例如，在同一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風貌迥異的區域文化教育——鄒魯、三晉、燕齊、荆楚文化教育，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作為漢文化教育基因的儒、墨、道、法各家的教育思想。除了漢文化教育外，還有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中國教育思想史，既反映了漢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論水準，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論水準。沒有多民族大家庭的不斷交流，多次大規模的碰撞、滲透、競爭、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教育思想史的發展。此外，除了上層的、貴族的、官辦的教育外，還有下層的、民間的、私人辦的教育；除了一般的道德、知識教育之外，還有專門的科技、藝術方面的教育。總之，無論從縱向還是從橫向考察，中國教育思想的發展總是具體的、歷史的、豐富的、多元的、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層次的立體網絡。

在這個立體網絡中，儒家教育思想佔有突出的地位。但儒家教育思想也不是靜態的、狹窄的、一

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涵蓋面很廣的範疇，具有包容性、延續性和浸透性的特點。如先秦時期的儒家教育思想，就包容了上古時代華夏族文化教育與夷狄族文化教育長期撞擊、融合而成的漢文化教育的豐富的實踐經驗；西漢時期的儒家教育思想，也吸取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學派（道、法、墨、陰陽等）的文化教育思想和經驗；宋明時期形成的理學教育思想，更是儒家、道家、玄學、佛教文化長期融合的產物，浸透了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官方與民間，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的終點。

以儒家教育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儒家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為軸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的非宗教體系。與以基督教為代表的歐洲傳統教育思想和以佛教為代表的印度傳統教育思想相比較，中國儒家教育思想的顯著特點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它強調的是對自身的肯定，人不僅與天地相參而且頂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內外」（即殊相與共相統一、主觀與客觀統一）。在這種「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種最高的、理智的幸福。儒家教育思想提出了一種「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並從中得到「做人」的樂趣，表現出人的精神境界。與基督教、佛教的教育思想不同，儒家教育思想不是悲觀型的，而是樂觀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樂感教育」；不是消極無為、逃避現世的，而是剛健有力、自強不息的；不是以個體為本位的，而是以羣體為本位的；不需要信仰和祈禱，不主張離開社會和家庭，而是強調在學校、家庭及日常生活積累道德行為，加強自我修養，即此岸即彼岸，「卽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面前而是到自己

心中尋找美醜善惡的標準，追求道德的「自律」而反對「他律」。

儒家教育思想把道德教育及其實踐作為最根本的實踐活動，這就很難解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矛盾。這種把道德教育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觀點，是一種歷史唯心論的觀點，相對的說，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教育思想不主張積極向外探求宇宙規律，而僅僅以人比附自然。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教育與科學技術相脫節，教育內容和考試內容都排斥科技知識。士子的學問，主要是追求「身心性命之學」和對儒家經典的考訂、解釋。

儒家教育思想既給我們民族增添了光輝，也為我們民族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它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和包袱。如何把我國傳統教育思想中的優秀方面發揚起來，如何克服和揚棄其消極方面，揚長避短，以有易無，對我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事業至關重要。探索我國教育思想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總結其歷史經驗和教訓，為教育改革當好「歷史顧問」，這是我們從事教育史研究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任務。這也就是撰寫這本書的根本目的。

「中國教育思想史」本身也是歷史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中國教育思想史」。雖然過往的教育歷史是不可逆的，我們對過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不得不借助前人的記載，並且必然要繼承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是我們對「中國教育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考却隨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深化、豐富。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興趣中心和感到焦慮的迫切問題，也都有自己獨特的經驗、見解、思維方式方法，所以我們也必須不斷地再寫「中國教育思想史」，使之隨着時代的發展進化而不斷地更新自己。我把這一本「中國教育思想史」奉獻給教育界、學術界以及廣大讀者，以引起人們注意，拋磚引玉，

5 前 言

希望今後出現更多的、有質量的、有較高認識水準和研究水準的、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中國教育思想史」來！

郭 齊 家

中國教育思想史 目 錄

序

前 言

第一章 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期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條件	一
第二節 孔丘的教育思想	七
第三節 墨翟的教育思想	五〇
第四節 孟軻的教育思想	六三
第五節 荀況的教育思想	九〇
第六節 《禮記》中的教育思想	一一〇
第七節 儒墨道法各家教育思想之比較	一三五

第一節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五二
第二節 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七一
第三節 稱康的教育思想.....	一八一
第四節 顏之推的教育思想.....	一九三
第五節 王通的教育思想.....	一〇一
第六節 韓愈的教育思想.....	一一三
第七節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一二二
第三章 宋元明清時期的教育思想.....	一三一
第一節 宋明理學教育思想通論.....	一三一
第二節 張載的教育思想.....	一四三
第三節 程顥、程頤的教育思想.....	一五八
第四節 朱熹的教育思想.....	二七二
第五節 陸九淵的教育思想.....	二九八
第六節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三一四
第七節 張居正的教育思想.....	三三一
第八節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三四八

第九節 顏元的教育思想 三六五

第四章 近現代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張之洞的教育思想 三七九
第二節 康有爲、梁啟超、嚴復的教育思想 三八〇
第三節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三九四
四一八

第一章 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期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條件

自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東遷雒邑，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統一中國，這前後五百多年的歷史，稱爲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以前的西周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占有形式，土地是天下之大宗——天子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見《詩經·小雅·北山》）。天子除留「王田」之外，其餘再分封給諸侯；諸侯又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又分封給家臣，一層層分封下來，由他們代管。這種天子所有、或稱爲「國有」的土地所有制，以及政治上實行以宗法制爲基礎的分封制度，決定了學校教育不可能有「私」的形式，只可能以「國」的形式出現。於是形成了「學在官府」、「官府學業」的局面，政教一體，官師合一。學校和學術、文化知識都掌握在官府中，典章制度、圖書文物、禮器樂器都收藏在宮廷中，擔任文教官職的是一些世代相傳爲貴族服務的祝、宗、卜、史，他們

既是官，又是師。正如黃紹箕所說：「古代惟官有學，而民無學。」因為「惟官有書，而民無書也」；「官有其器，而民無其器也。」所以說：「學術既專爲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屬。」❶

到了春秋時期，鐵犁和牛耕逐漸普遍使用，生產力大大提高，有些下層奴隸主和少數處於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平民，利用逃亡的奴隸開墾私田耕種。爲了提高私田的生產力，他們採用一些新的辦法對待農奴，讓他們分享私田的生產收入和保有自己的生產工具。這就在奴隸社會內部逐漸形成封建性的生產關係，爲奴隸社會向封建主義社會過渡準備了條件。

封建私有制在奴隸制的母胎裏發生發展，新興地主階級逐漸在一些諸侯國裏取得了政權，這就促進了奴隸制解體。於是，「學在官府」的壟斷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經濟支柱和政治依據，造成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局面。所謂「失官」，指的是官府失守學術，以致使使其不能世代相傳。所謂「四夷」，並非指四方的少數民族，而是指文化學術下移，禮流散於四野。這時政治中心逐漸由周天子轉向勢力較強的諸侯國，政治中心的轉移導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轉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禮器樂器也就隨之擴散到四夷。同時，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力量增強，也在教育上要求打破原來的「學在官府」的形式，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知識，接受教育，培育自己需要的人才。所有這些，都爲舊的官學衰落和新的私學興起創造了條件。

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內部發生了新的分工，即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進一步分工，產生了單純的腦力勞動者，生產精神財富。這一分工是歷史的進步。從這次「真實的分工」出現後，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專門「志於道」的「士」。

「士」本來是貴族中的最低階層，曾受過一些封建社會的教育，通曉禮、樂、射、御、書、數，能文能武，戰爭的時候，充當下級軍官，和平的時候，則充當貴族在政治上的助手。他們可以食用，職位也是世襲的。由於春秋時代的動蕩，貴族的沒落，「士」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和職守，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一批靠着自己過去掌握的「六藝」知識來自謀生活的知識分子。他們把原來秘藏於官府中的典籍文物、禮器樂器帶到了民間。這就出現了「學術文化下移」的趨勢。據《論語·微子》記載，原在周王宮裏的司禮、司樂的一批有文化知識的人，如樂官摯跑到齊國，樂師干跑到楚國，樂師繚跑到蔡國，樂師缺跑到秦國，打鼓的方叔入居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入居漢水之涯，樂官陽和擊磬的襄入居海邊去了。樂師的情況如此，其他方面的官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時，在鄒魯地區出現了一批「搢紳」先生，穿戴着峨冠博帶，常在貴族交際酬酢以及舉行冠、婚、喪、祭等禮儀時出面，他們熟悉「六藝」知識和各種禮儀，號稱「師儒」，也就是「士」。

士是一個新興的有强大生命力的階層，各諸侯國的執政者從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的需要出發，爭先「招賢納士」。「士」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成為統治者競相爭取的對象，於是興起了養士和用士之風。如齊桓公「養游士八十人」，採用「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之」的政策，《國語·齊語》遂成霸業。到了春秋末期，私門和公室相爭，公室養士，私門也爭相養士。所謂公室，指的是國君。所謂私門，指的是權豪之門。如：齊陳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又如：魯執政大夫季昭子「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其目的「不在所與居，

在所與謀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昭子和孔子之徒商討如何發展自己的勢力，削弱魯公室的勢力。到了戰國，養士達到高潮，國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一度為士衆所歸。尤其是齊威王和齊宣王建築了高門大屋的稷下學宮，「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徐干《中論·亡國》）卿相如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魏國的信陵君（無忌）以及秦相呂不韋等，養士都以千計。當時社會輿論已經用士的聚散來衡量一國政治的興衰，對於這種情況，各國執政者是很敏感的。西漢的東方朔在《答客難》中概括這一局面為「得士者存，失士者亡」，說明當時「士」的階層，雖無權無勢，却以一個新生的力量縱橫於天下。這表明「士」已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他們就是中國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和第一代教師羣。

養士之風盛行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士既成為一種職業，而且身價很高，不少人以此做為進身的捷徑，所以爭着學做士，紛紛就學讀書，希望有朝一日能「學而優則仕」。可以說，春秋末期的私學及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就是在這種土壤上生長起來的。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私學以齊魯為發祥地，很快向各地發展，在這個潮流中，孔子起到了開闢道路的作用。孔子的私學，是由「學在官府」到「百家之學」的轉折點。他為中國教育史開闢了新紀元。直接促進了文化學術下移和士階層的崛起。墨子也曾創辦私學，規模和影響也很大，與孔子的儒家私學並稱為「顯學」。孔子的學生及後學仍從事教育工作，培養了不少人才，子思、孟軻、荀況等對後世影響也不小。墨子的學生及後學禽滑厘、孟勝等也繼承並發展了墨家私學。《呂氏春秋·當染》云：「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其盛況可知。其他如道、法、名、農、縱橫家